

农民社会阶层越高越幸福吗?

——基于 CGSS 2010—2015 年数据的微观分析

王 敏, 王 峰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4)



摘 要 针对农民社会阶层与幸福感问题,通过分析 2010—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响应 Logit 模型估计,实证检验了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幸福效应,社会阶层定位越高的农民,其幸福感越强;进一步区域比较发现,此幸福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而户籍比较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低于城镇居民;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较 10 年前有所增强,且农民对社会阶层定位有较为乐观的预期。据此提出,民生建设中重视农民的发展诉求和精神需求,融通农民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从而提高农民幸福感,保障农民公平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关键词 农民; 社会阶层定位; 幸福感; 幸福效应; 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 D 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9)03-0120-10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19.03.015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人民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现阶段,满足人民的精神层面诉求,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成为新时代的民生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并强调“让广大农民有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提高农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应把握和了解农民真实的精神层面诉求。已有研究证实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及环境卫生等皆是影响农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4]。其中,社会阶层是制约农民获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目前农民在我国社会阶层中处于中下层或底层,且其内部出现了阶层分化问题^[5-7]。因此,关注社会阶层问题,是提高农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举措。

社会阶层包括客观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定位,客观社会阶层主要依据农民收入水平、职业类别、消费、声望以及家庭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情况等指标进行划分^[8]。社会阶层定位^①由社会成员根据某项标准对自己归属于社会分层体系中的相应层次做出的主观认知^[9],其已经成为人们获得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阶层定位能够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10]。国外研究者关注社会阶层定位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证实了社会阶层定位越高,居民幸福感越强^[11-12]。而在国内,鲜有研究者对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之间关系进行过论证,有关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基于 2010—2015 年^②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分析社会阶层定位与农民幸福感的发展趋势,并通过实证模型,检验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8-09-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制度安排与业主组织治理能力的关联性研究:基于多维的制度要素分析”(71774107)。

作者简介:王 敏(1990-),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经济政策。

通讯作者:王 峰(1977-),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经济政策。

① 与社会阶层定位(class identification)相同或者相似的概念包括阶层认同(class identity)、主观社会阶层(subjective social class)、主观社会位置(subjective social location)、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及自评阶层(self-rated class)等。

② CGSS 调查项目在 2014 年未实施相关调查,故本文无相关数据。

一、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社会阶层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涉及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定位。客观社会阶层研究中,“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职业分类基础上,依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及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13]。农民客观社会阶层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农民逐步分化成从事多种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多样阶层^[14-15]。

与客观社会阶层不同的是,主观社会阶层定位能够较好地反映人们的心理诉求^[16]。社会阶层定位的研究方法上,最具代表性的测量工具是MacArthur量表(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17],它是一个10级阶梯量表,代表了具有不同水平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的人所处的位置,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感知判断所处的社会阶层。另外,部分研究中将社会阶层定位分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及上层五个层次,研究对象根据自身的感知判断所处的社会阶层^[18-19]。研究者对我国居民的社会阶层定位整体情况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社会阶层定位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向下偏移的倾向,呈现保龄球状^[19-20]。

制度变化影响人们的社会阶层定位^[21],就我国来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社会阶层定位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一是研究者较为关注城镇户籍居民社会阶层定位,但城镇居民存在高估自身社会阶层的问题^[22],城镇居民社会阶层定位整体上呈现“横向偏低、纵向下降”的局面^[23]。家庭出身、父辈社会地位、住房等皆是影响城镇居民社会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24],就住房来说,拥有自有产权、住房面积较大、住房市值较高的居民更倾向于认同自身属于社会的较高阶层^[25]。二是已有研究对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研究较为薄弱,缺乏对社会阶层定位水平的测度,以及社会阶层定位影响农民感受的研究。研究者从住房消费视角分析农民工的社会阶层认同,证实了人均居住面积及人均住房支持的比例越大,农民工的社会阶层认同越高^[26]。针对农村女性的社会阶层研究表明,配偶及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共同决定了农村女性的社会阶层认同^[27]。三是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阶层定位差异逐步受到重视,但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研究证实农村青年社会阶层定位比城镇青年低,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政治面貌等皆是影响青年社会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28]。这与城镇青年形成了较大的结构反差,反映了城乡差异性在人们主观意识形态中已经体现。本文在测度农民社会阶层定位水平基础上,从农民幸福感角度,验证了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并进行城乡之间的比较研究。

社会阶层定位通过人的心理和行为来影响社会,幸福感作为农民生活状态的综合反映^[29],提高农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幸福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体验,其受多元需求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说可以归为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影响幸福的因素包括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社会支持以及积极情绪、健康的人格等^[30-32]。而从物质因素的角度来看,包括个人的经济条件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知^[33-34]。

农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存在一定的争议,一方面,研究者指出农民幸福感存在“小富即安”的基本特征。研究表明生活变化程度、亲邻之间比较及家本位文化观念都影响农民的幸福感,农民具有“小富即安”的基本特征,而农民的这种满足感与感恩心正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需要的价值观^[35]。Knight等在对2002年中国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中发现,即使在城乡差距扩大背景下,仍有60%的农民感觉幸福或非常幸福^[36]。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指出我国农民幸福感的总体水平一般,尚未达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程度,教育资源匮乏及养老保障水平过低是制约农民获得幸福的重要因素^[37]。就社会保障来说,社会养老存在较大的缺口,较少的养老金,以及新农合报销比例低、报销范围窄等问题,都制约了农民获得幸福感^[38]。研究者们也对提高农民幸福感的可行路径进行了丰富的探索,村庄民主、改善村庄公共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等皆能够提高农民幸福感^[39-41]。

社会阶层定位、幸福感皆是人们的主观情感与心态^[29]。国外的研究者证实了社会阶层定位影响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表明相对于低社会阶层定位者,高阶层者更多地体验到幸福^[10-11]。国内研究者证实了社会阶层定位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公平感及安全感^[20],但尚无研究者论证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提高农民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民生目标,而社会阶层定位也备受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厘清社会阶层定位与农民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社会意义。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1.数 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该项调查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式保障项目的合理性,调查对象涉及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本文主要选取了 2010—2013 年及 2015 年共 5 年数据,并依据“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选取农村户籍样本。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了社会阶层定位、社会态度(幸福感)、社会人口属性及所在家庭社会属性衡量指标。为了保证研究的真实性、合理性,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分类和处理,剔除了户籍状况、社会阶层定位以及幸福感等主要变量为缺失值的样本,共获得 20 716 份农村户籍样本。同时,为了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农村户籍样本中,选取了 11 025 份长期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样本。

户籍特征与区域特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一方面,为了比较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异性,本文整理了 2010—2015 年 CGSS 数据中的城镇户籍样本,共获得 18 296 份城镇居民样本;另一方面,为了探究区域特征,本文整理了《2010—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 31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人均 GDP 值,用于验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可能存在的区域特征。

2.变 量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验证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农民幸福感(*happiness*)为因变量,涉及幸福感的问卷内容为:“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则分为 5 个层次:“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一般=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可供参考的研究中,研究者将主观幸福感分为不同的层次,并以此作为因变量,分析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子女性别及健康自评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28]。

社会阶层定位(*class identification*)为本文的自变量,在 CGSS 社会调查项目中,涉及社会阶层定位的问卷内容为:“在现今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选项则分为 10 个阶层,其中最高“10 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 分”代表最底层。其中涉及社会阶层定位的自变量有:个人当前社会阶层定位(*class identification*)、个人十年前社会阶层定位(*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个人未来十年社会阶层定位(*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

本文控制了农民的社会人口属性,主要涉及农民的性别(*gender*)、年龄(*age*)、婚姻状况(*marriage*)、政治面貌(*political status*)、收入水平(*income*)、受教育年限(*eduy*)及健康水平(*health*),其中收入水平与受教育年限为客观社会阶层定位度量指标^[29],能够提高本文研究的科学性。同时,根据论文的研究需要,本文选择了 31 个^①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均 GDP 作为经济属性的度量指标,并在后续模型分析中,设定了社会阶层定位与人均 GDP 的交互项指标。详细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3.方 法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幸福感(*happiness*)为排序数据(*ordered data*),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采用有序响应 Logit 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来分析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42],并借助 STATA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模型表达式如下:

① CGSS 项目调查涉及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自治区,鉴于西藏自治区的样本量较少,本文未考虑西藏自治区。

$$Happiness_i = \beta_0 + \beta_1 class_i + \beta_2 pastclass_i + \beta_3 expectedclass_i + \partial X_i + \overline{province} + \overline{year} + \epsilon_i \tag{1}$$
$$Happiness_i = \beta_0 + \beta_1 class_i + \beta_2 class_i \times GDP_i + \beta_3 pastclass_i + \beta_4 pastclass_i \times GDP_i + \beta_5 expectedclass_i + \beta_6 expectedclass_i \times GDP_i + \partial X_i + \overline{province} + \overline{year} + \epsilon_i \tag{2}$$

表 1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社会态度	幸福感(<i>happiness</i>)	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一般=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	3.78	0.87
	当前社会阶层定位(<i>class identification</i>)	10 级阶梯量表;最底层=1;最高层=10	4.04	1.69
社会阶层定位	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i>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i>)	10 级阶梯量表;最底层=1;最高层=10	3.20	1.73
	未来 10 年社会阶层定位(<i>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i>)	10 级阶梯量表;最底层=1;最高层=10	5.16	2.07
	性别(<i>gender</i>)	虚拟变量,男=1	0.54	0.50
社会人口属性	年龄(<i>age</i>)	对数值(<i>lnage</i>)	48.27	15.07
	婚姻状况(<i>marriage</i>)	虚拟变量,已婚=1	0.91	0.28
	政治面貌(<i>political status</i>)	虚拟变量,中共党员=1	0.05	0.23
	受教育年限(<i>eduy</i>)	对数值(<i>lneduy</i>)	6.83	3.90
	收入水平(<i>income</i>)	对数值(<i>lnincome</i>)	17 819	12 4141
	健康水平(<i>health</i>)	非常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健康=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水平=5	3.57	1.12
经济属性	GDP	2010—2013 年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均 GDP(<i>lngdp</i>)	145 960	55 098

式(1)中 $Happiness_i$ 代表第 i 位农民幸福感情况,自变量为 $class\ identification$ (当前社会阶层定位)、 $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 (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 $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 (未来 10 年社会阶层定位), $\overline{province}$ 为省份固定效应, \overline{year} 为年份固定效应, ϵ_i 为误差项。一方面是运用式(1)分析全样本中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另一方面进行农民及城镇居民的分样本验证,以期探究可能存在的户籍特征。式(2)中加入了社会阶层定位与人均 GDP 的交互项: $class\ identification \times GDP$ 、 $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 \times GDP$ 及 $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 \times GDP$,用于验证区域特征。相似地,本文在回归分析中,构建了社会阶层定位与年份($year$)的交互项,用于验证社会阶层定位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发展趋势,在此不做赘述。

式(1)的基本研究机理如下:

$$Happiness_i = 1; \text{如果 } Happiness_i^* < C1$$
$$Happiness_i = 2; \text{如果 } C1 < Happiness_i^* < C2$$
$$Happiness_i = 3; \text{如果 } C2 < Happiness_i^* < C3$$
$$Happiness_i = 4; \text{如果 } C3 \leq Happiness_i^* < C4$$
$$Happiness_i = 5; \text{如果 } C4 \leq Happiness_i^*$$

式(1)中,假定 ϵ_i 是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并用 $\mu(.)$ 表示其累计分布函数,被解释变量 $Happiness_i$ 的分布如下:

$$Pr(Happiness_i = 1) = \mu(C1 - X\beta)$$
$$Pr(Happiness_i = 2) = \mu(C2 - X\beta) - \mu(C1 - X\beta)$$
$$Pr(Happiness_i = 3) = \mu(C3 - X\beta) - \mu(C2 - X\beta)$$
$$Pr(Happiness_i = 4) = \mu(C4 - X\beta) - \mu(C3 - X\beta)$$
$$Pr(Happiness_i = 5) = 1 - \mu(C4 - X\beta)$$

三、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的基本情况与变化特征

1. 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基本情况

把握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的基本情况,能够为后续的实证检验提供现实基础。总体来看,2010—2015 年期间农民社会阶层定位有所增长,但整体水平较低,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符^[18],但本文发现农民对未来社会阶层定位的预期较为乐观。同时,74.3%的农民处于“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状态,农民幸福感仍有提升空间。

受访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横向来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持续上升,当前社会阶层定位较 10 年前有所增长。同时,农民对未来 10 社会阶层定位的预期较为乐观,其社会阶层定位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纵向来看,2010—2015 年期间,受访农民 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和未来 10 年社会阶层定位波动性较大,但其当前社会阶层定位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受访农民幸福感基本情况如图 1 所示,处于“比较幸福”的农民样本量达到了 12 160 份,占比达到了 58.7%,处于“非常幸福”与“一般”的农民样本量基本持平,分别为 3 232 份(15.6%)和 3 319 份(16%)。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存在“小富即安”的特征^[35],现阶段农民的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等皆有所提高,使得农民对未来阶层保持较为乐观的预期,也使得农民的幸福感受到提升。

表 2 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基本情况

年份	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	当前社会阶层定位	未来 10 年社会阶层定位
2010	2.92	3.85	5.06
2011	4.00	3.99	5.28
2012	3.07	4.06	5.25
2013	3.16	4.08	5.20
2015	3.27	4.09	5.10

2. 区域不平衡性特征

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常态。早期的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在对居民社会阶层定位研究中,将东中部、西部地区城市人口社会阶层定位进行了比较分析,其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人口社会阶层定位低于东部地区^[13]。研究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皆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社会阶层认同与幸福感皆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现象。究其原因,社会发展水平深刻地影响居民主观感受,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使得农民保持较高的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

3. 城乡差异性特征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城镇居民与农民组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群体^[43],并对中国社会阶层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部分学者就户籍制度对社会阶层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证实了户口作为获取体制内资源的门槛,深刻地影响社会阶层与流动^[44]。因此,本文关注农民与城镇居民两个群体的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的差异性,具体如图 2 和图 3 所示。就社会阶层定位来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增长缓慢,而城镇居民社会阶层尽管波动性较大,但增长幅度较大。因此,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城乡差异,且农民社会阶层定位水平较低。就幸福感来看,农民幸福感低于城镇居民。尽管在 2011 年和 2013 年期间,农民与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 2015 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研究者通过构建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回归模型,证实健康水平、家庭条件、生态环境及社会保障是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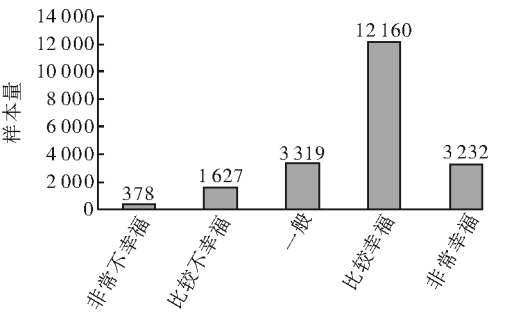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幸福感总体情况(2010—2015 年)

致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民的主要原因^[45-46]。那么,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教育资源、城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均衡性是导致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皆低于城镇居民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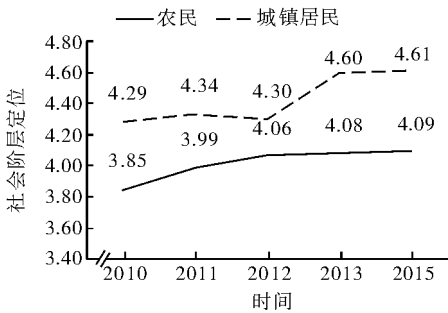


图 2 农民与城镇居民社会阶层定位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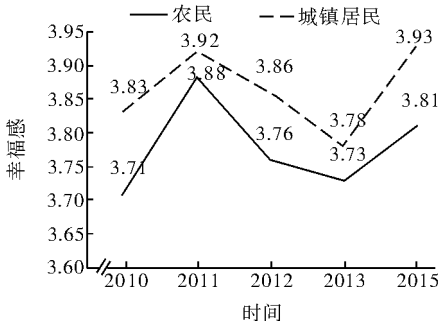


图 3 农民与城镇居民幸福感走势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1.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

表 3 为全样本回归结果,主要验证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证实了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具体来看,当前社会阶层定位(class identification)对居民幸福感(happiness)有最为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优势率(odd sratio)达到了 0.295,也就是说当前社会阶层定位越高,农民幸福感越强。同时,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未来 10 年社会阶层定位(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其优势率(odds ratio)高于 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综合来看,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当前社会阶层定位与未来十年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较 10 年前呈现大幅度增长。农民社会阶层定位是其对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重要判断,那么其较高的社会阶层定位,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从而增加自身的认同感、满足感、幸福感。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性别因素(gender)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呈现负向效应,也就是说女性农民幸福感高于男性农民,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呼应^[36]。年龄(age)、受教育年限(eduy)、收入水平(income)皆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同时,政治面貌(political status)、健康水平(health)和婚姻状况(marriage)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皆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相符^[47]。

2.区域特征与发展趋势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的内部特征,本文进行了区域特征与发展趋势的回归检验。一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表 3 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

N = 20 716				
	Ologit(1)	Ologit(2)	Ologit(3)	
社会 阶层 定位	<i>class</i>	0.295 * * *		
	<i>identification</i>	(0.009)		
	<i>past class</i>	0.140 * * *		
	<i>identification</i>	(0.008)		
	<i>expected class</i>		0.251 * * *	
	<i>identification</i>		(0.007)	
	<i>gender</i>	−0.146 * * * (0.030)	−0.214 * * * (0.030)	−0.155 * * * (0.030)
	<i>age</i>	0.014 * * * (0.001)	0.016 * * * (0.001)	0.021 * * * (0.001)
	<i>eduy</i>	0.014 * * * (0.005)	0.018 * * * (0.005)	0.013 * * * (0.005)
社会 人口 属性	<i>income</i>	0.080 * * * (0.015)	0.127 * * * (0.015)	0.086 * * * (0.015)
	<i>political status</i>	0.272 * * * (0.063)	0.298 * * * (0.062)	0.288 * * * (0.063)
	<i>health</i>	0.392 * * * (0.014)	0.432 * * * (0.014)	0.395 * * * (0.014)
	<i>marriage</i>	0.324 * * * (0.052)	0.385 * * * (0.052)	0.394 * * * (0.052)
	<i>provinces</i>	Yes	Yes	Yes
	<i>Years</i>	Yes	Yes	Yes

注:所有回归均控制了省份和调查年份的固定效应,括号中为标准误,*、**、***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下同。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中以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人均 GDP 值作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48],构建了社会阶层定位指标与人均 GDP 的交互项,用于检验社会阶层定位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区域特征。另一方面,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 CGSS2010—2015 年共 5 年数据,构建年份交互项能够检验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发展趋势。回归结果显示,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且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表 4 为回归结果,首先,从社会阶层定位与人均 GDP 的交互结果来看,当前社会阶层定位交互项(*class identification*×*GDP*)、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交互项(*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GDP*)与未来 10 年社会阶层定位交互项(*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GDP*)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皆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而证实了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存在区域不平衡性,其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更为显著。其次,从社会阶层定位与年份(*YEAR*)的交互结果来看,当前社会阶层定位交互项(*class identification*×*YEAR*)影响农民幸福感的优势率(*odds ratio*)为 0.076,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交互项(*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YEAR*)与未来 10 年社会阶层定位交互项(*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YEAR*)影响农民幸福感的优势率(*odds ratio*)分别为 0.036 和 0.064。从而证实了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增强,存在逐年增强的发展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越来越看重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在当前民生建设过程中应重视农民的这一变化,才能有效提高农民幸福感。

3. 户籍特征检验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阶层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影响人们的幸福感^[33]。为了探究户籍制度对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从 2010—2015 年 CGSS 数据中挑选出 18 296 份城镇居民样本,并构建了有序响应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合上文全样本分析中的农民样本回归结果,组成了完整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回归结果。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定位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高于农民,且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和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皆较 10 年前有所增强。

从回归结果来看(如表 5 所示),当前社会阶层定位影响城镇居民幸福感的优势率(*odds ratio*)达到了 0.333,高于农民的 0.295,也就是说当前社会阶层定位对城镇居民的正向效应高于农民。同样,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与未来 10 年社会阶层定位影响城镇居民幸福感的优势率(*odds ratio*)分别为 0.142 和 0.280,皆高于农民。从而验证了社会阶层定位对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存在城乡差异。户籍制度导致的社会分层现象,反映了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也体现了户籍身份上粘附着有差别的价值^[23]。农民在教育资源、生活机会等方面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使得其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弱于城镇居民。

表 4 区域特征与发展趋势验证

N=20 716

	Ologit(1)	Ologit(2)	Ologit(3)
<i>class identification</i>	0.295 *** (0.009)		
<i>class identification</i> × <i>GDP</i>	0.025 *** (0.001)		
<i>class identification</i> × <i>YEAR</i>	0.076 *** (0.003)		
<i>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i>		0.140 *** (0.008)	
<i>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i> × <i>GDP</i>		0.012 *** (0.001)	
<i>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i> × <i>YEAR</i>		0.036 *** (0.003)	
<i>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i>			0.251 *** (0.007)
<i>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i> × <i>GDP</i>			0.021 *** (0.001)
<i>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i> × <i>YEAR</i>			0.064 *** (0.002)
<i>control variables</i>	Yes	Yes	Yes
<i>provinces</i>	Yes	Yes	Yes
<i>Years</i>	Yes	Yes	Yes

表 5 社会阶层定位影响农民幸福感的户籍特征

	农民	城镇居民
	Ologit(1)	Ologit(2)
<i>class identification</i>	0.295 *** (0.009)	0.333 *** (0.010)
<i>past class identification</i>	0.140 *** (0.008)	0.142 *** (0.009)
<i>expected class identification</i>	0.251 *** (0.007)	0.280 *** (0.008)
<i>control variables</i>	Yes	Yes
<i>provinces</i>	Yes	Yes
<i>Years</i>	Yes	Yes

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关于因变量为幸福感或信任等有序变量时的定量分析方法,采用线性 OLS 回归验证结果的稳定性^[34]。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其结果显示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与前文(表 3)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且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较为显著,从而证实了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同时,本文按照职业类型在农民样本中,抽取了拥有农村户籍且长期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样本,共获得 11 025 份有效样本,并进行回归分析。表 7 为回归结果,证实了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具体来看,当前社会阶层定位、10 年前社会阶层定位及未来 10 年社会阶层定位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皆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三者与人均 GDP、年份(YEAR)的交互项也较为显著。这一结果与前文中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 CGSS2010—2015 年数据的微观分析,发现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基本现状分析中的研究发现:一是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皆有所增长;二是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皆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东部地区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三是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存在户籍差异性,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皆低于城镇居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发现:一是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社会阶层定位越高,农民幸福感越强;二是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存在区域不平衡特征;三是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增强;四是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低于城镇居民,户籍制度成为影响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满足人民的精神层面诉求”,只有了解和把握农民的精神诉求内容,才能有效提高其幸福感和获得感。本文对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的研究,正是对农民的精神诉求的探究,相关研究结论对于重视和提高农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方面,社会阶层定位反映了农民对自身所处阶层的主观感知,而其较低的社会阶层定位以及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是民生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低于城镇居民,既反映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民公平获得发展的机会,也反映了农民并没有公平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农民仍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政策应从提高农民社会阶层定位入手,才能有效提高农民幸福感。

在民生建设过程中,应以增进农民福祉为发展的重要目标。一是应从制度层面缓解当前的城乡社会分层现象,建立公平的城乡教育资源、社会保障资源等方面的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具有平等的发

表 6 OLS 模型估计结果 N=16 935

	OLS(1)	OLS(2)	OLS(3)
<i>class</i>	0.112***		
<i>identification</i>	(0.004)		
<i>past class</i>		0.052***	
<i>identification</i>		(0.004)	
<i>expected class</i>			0.091***
<i>identification</i>			(0.003)
<i>gender</i>	-0.044***	-0.073***	-0.050***
	(0.013)	(0.013)	(0.013)
<i>age</i>	0.005***	0.005***	0.007***
	(0.001)	(0.001)	(0.001)
<i>eduy</i>	0.107***	0.127***	0.099***
	(0.025)	(0.026)	(0.026)
<i>income</i>	0.035***	0.056***	0.039***
	(0.007)	(0.007)	(0.007)
<i>political status</i>	0.086***	0.100***	0.095***
	(0.026)	(0.026)	(0.026)
<i>health</i>	0.161***	0.181***	0.163***
	(0.006)	(0.006)	(0.006)
<i>marriage</i>	0.158***	0.186***	0.186***
	(0.022)	(0.022)	(0.022)
<i>provinces</i>	Yes	Yes	Yes
<i>Years</i>	Yes	Yes	Yes

表 7 社会阶层定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正向效应

	N=11 025		
	Ologit(1)	Ologit(2)	Ologit(3)
<i>class</i>	0.276***		
<i>identification</i>	(0.012)		
<i>past class</i>		0.127***	
<i>identification</i>		(0.012)	
<i>expected class</i>			0.245***
<i>identification</i>			(0.010)
<i>control variables</i>	Yes	Yes	Yes
<i>provinces</i>	Yes	Yes	Yes
<i>Years</i>	Yes	Yes	Yes

展机会,才能有效融通农民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二是本文研究发现农民对未来的社会阶层预期较为乐观,这既是对当前民生建设成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民生建设中应重视农民的发展需求,为农民创造公平发展的社会条件,从而在保障农民提升社会阶层的同时,又能够缩小农民内部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三是农民社会阶层定位与幸福感的区域不平衡性是影响民生建设的全局问题,长期的经济发展区域分化问题已经导致东中西部农民社会阶层与幸福感分化,在充分重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民社会阶层与幸福感,从而实现提高全体人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民生建设目标。四是政府推行了各项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但对农民的精神需求重视不足。因此,应把握农民的精神需求,丰富农村文化建设,保障农民“安居乐业”,逐步提高农民的幸福感,使其公平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参 考 文 献

[1] 陈卓,续竞秦,吴伟光.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来自浙江省 4 县(市)的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6(10):38-48.

[2] 霍灵光,陈媛媛.“新农合”:农民获得幸福感了吗? [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19(2):38-49.

[3] 张洪源,周海川,苗润莲.社会保险选择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世界农业,2018(3):56-62.

[4] 聂建亮,钟涨宝.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农村老人幸福感——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60-68,132-133.

[5]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6] 王春光,赵玉峰,王玉琪.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J].社会学研究,2018,33(1):63-88.

[7] 谭银清,钟益芳.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基于 CLDS2014 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87-92,147-148.

[8] 李强.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J].北京社会科学,2008(5):47-60.

[9] JACKMAN,MARY R,ROBERT JACKMA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on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3(38):569-582.

[10] FROMM E.The sane society[M].Greenwich:Fawcett Premier Books,1955:502-514.

[11] GALLO L C,MATTHEWS K A. Understand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hysical health;do negative emotions play a role?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3,129(1):10-51.

[12] HOWELL R,HOWELL C J.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status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meta-analy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8(134):536-560.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4(5):21-27.

[14] 金晔.当前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刍议——以西南地区 H 村为中心的考察[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41-44.

[15] 杨华.建构农村阶层关系研究概念体系[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83-90.

[16] ADLER N,SINGH MANOUX A,SCHWARTZ J,et al. Social status and health;a comparison of british civil servants in white hall-II with European-and African-Americans in cardia[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08,66(5):1034-1045.

[17] ADLER N E,EPEL E S,CASTELLAZZOG,et al.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J].Health psychology,2000,19(6):586-592.

[18] 范晓光,陈云松.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J].社会学研究,2015,30(4):143-245.

[19] 陈云松,范晓光.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J].中国社会科学,2016(12):109-126,206-207.

[20] 高勇.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J].社会,2013,33(4):83-102.

[21] BRINTON MARY C,VICTOR NE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J]. Russel sage foundation,1998(6):345-371.

[22] 张翼.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全国性 CGSS 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3):65-74.

[23] 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149-208.

[24] 韩钰,仇立平.中国城市居民阶层地位认同偏移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5,2(1):1-17.

[25] 张海东,杨城晨.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32(5):39-63.

[26] 赵晔梁,梁翠玲.融入与区隔: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基于 CGSS 2010 的数据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4,20(2):23-32.

[27] 敖杏林.影响农村妇女阶层认同的诸因素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15,2(4):166-182.

[28] 侯志阳,孙琼如.城乡青年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0(3):53-57.

[29] GROSSMANN I,VARNUM M E. Social class,culture,and cognition[J].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2011,2(1): 81-89.

[30] 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J].心理学动态,1996(1):46-51.

[31] RYFF C D,SINGER B. Interpersonal flourishing:a positive health agenda for the new millennium[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2000,4(1):30-44.

[32] 吴明霞.30 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心理学动态,2000(4):23-28.

[33] 陈钊,徐彤,刘晓峰.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2,35(4):79-101.

[34] 陆方文,刘国恩,李辉文.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J].经济研究,2017,52(10):173-188.

[35] 廖永松.“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4(9):4-16.

[36] KNIGHT J,SONG L,GUNATILAK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 (20):635-649.

[37] 熊彩云,孟荣钊,史亚峰.我国农民幸福指数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12):33-40.

[38] 张洪源,周海川,苗润莲.社会保险选择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世界农业,2018(3):56-62.

[39] 胡洪曙,鲁元平.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2(10):23-33.

[40] 陈前恒,林海,吕之望.村庄民主能够增加幸福吗? ——基于中国中西部 120 个贫困村庄 1800 个农户的调查[J].经济学(季刊), 2014,13(2):723-744.

[41] 王兵,杨宝.村庄公共支出规模、结构和农民幸福感[J].中国行政管理,2018(2):53-57.

[42] APPLETON S,SONG L.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J].World development,2008(36):2325- 2340.

[43] 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41-49.

[44] 李强.现代化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影响[J].东南学术,2000(2):12-17.

[45] 张军华.幸福感城乡差异的元分析[J].社会,2010,30(2):144-155.

[46] 王慧慧.近十年来国内居民幸福感研究要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6):80-85.

[47] MYERS D G.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quality of life[M]//KAHNEMAN D,DIENER E,SCHWARZ N.Well-being:the founda- 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9:374-391.

[48] 潘文卿.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收敛[J].中国社会科学,2010(1):72-84,222-223.

(责任编辑:毛成兴)